

先秦时期

「德」

观念源流考论

◎ 李德龙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论

李 德 龙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论 / 李德龙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77-7190-1

I. ①先… II. ①李… III. ①道德修养—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7281号

书 名: 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论

作 者: 李德龙 著

责任编辑: 陈颂琴 责任校对: 张瑞伦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80千字

ISBN 978-7-5677-7190-1

封面设计: 谢冬凌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印刷

2016年7月 第1版

2016年7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吕文郁

近几年来，我指导的多位博士生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都陆续地正式出版了，作为他们的指导教师，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似乎比我自己的著作问世还要高兴。回想当年我自己博士论文的出版过程，不免感慨系之。

我 1988 年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迩来近三十年矣。那时国内人文学科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的导师屈指可数，每年获得学位的博士数量非常有限。我们毕业的 1988 年，全国（港澳台除外）获得文史哲类博士学位的总共才 108 人，这对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又经历“十年内乱”造成了人才严重断层的大国来说，不说是凤毛麟角，起码也属稀缺之物。这 108 人的姓名、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指导教师、专业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等信息全部刊载于《文献》杂志 1989 年第 1 期。学界有人戏称这 108 人为“一百单八将”。我忝列其中，与有荣焉。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各高校相关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我自认为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得相当用心，论文的独创性及学术价值也得到导师和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答辩之后我曾热切地期盼自己的博士论文能早日公之于世。但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加之当时百废待兴，尽管每年毕业的博士数量很少，国家却无力为他们的学位论文提供出版资助。当时的出版界为了求生存，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对于发行量有限、不能赚钱甚至还要亏本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社自然没有兴趣。而我们这些刚刚获得学位不久的博士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多数都还默默无闻，用当下文艺界惯用的行话来说，叫作尚未“出道”。有谁愿意赔钱为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出版学术著作呢？在当时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呼吁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设立《博士文库》，但每年能够出版的博士论文数量少得可怜。国内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大约在 1991 年，我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台湾文津出版

社正在编辑出版《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的消息，我便冒然把我的博士论文油印稿寄了过去，当时并未抱什么希望，不过是在多方努力却毫无进展之后的无奈之举。不料文津出版社社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镇京先生读后大为赞赏，很快就给我回信，并同时寄来了出版合同。邱镇京社长在回信中对我的博士论文《周代采邑制度研究》的学术价值做了充分肯定后说：如此重要的学术著作若不能出版，不仅是作者的终生遗憾，也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但大作中引用的金文资料太多，这为文字录入和制版工作平添许多困难（案：当时的计算机汉字录入程序中尚无古文字造字软件），我们决定克服这些困难，使大作尽快出版。得到海峡彼岸出版界的积极回应，我喜出望外，很快与该社签定了出版合同。大约在半年之后的1992年夏季，我收到了文津出版社寄来的样书。看到这些装潢典雅、印制精良的样书，欣喜之余，也不免为自己这部处女之作问世之艰难坎坷而浩叹不已。

若干年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指导博士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士生越招越多，不知不觉中先后指导的博士生已多达二十余人。他们一批又一批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也遇到了学位论文出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总体上感觉他们要比当年的我们幸运得多：此时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我们获得学位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已有较大改观；最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和国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于专业方向决定，我指导的博士生们选择的学位论文题目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国学的范畴，这也是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够有机会出版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来，他们的学位论文有的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资助项目，有的获得了所在单位专项基金的资助，从而得以顺利出版，这都是当年我们所不能奢望的。

李德龙博士的《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论》所重点研究探讨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观念之一。前人对这一观念已经做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由此引发的诸多学术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这一问题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前人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一课题的学术专著至今尚付阙如。老实说，完成这样的课题

有相当大的难度，往往成功的几率不高。德龙敢于选择这样的课题来做博士学位论文，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需要有攻坚的勇气和足够的耐心，更需要有为学术事业献身的敬业精神。德龙经过顽强的努力，终于攻克了重重学术难关，把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有关“德”观念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譬如当下社会热议的法治与德治二者的关系问题，这与现实社会的反腐斗争密切相关。去年4月中旬，在贵阳孔学堂召开了一次学术辩论会，我曾作为辩论嘉宾应邀出席了这次辩论会。辩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怎样才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的问题。辩论会上双方争论很激烈，辩论的全过程通过媒体对外转播，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之后不久，深圳市图书馆举办的《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栏目邀请我和深圳大学文学院牛鹏涛博士就《尚书》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作学术演讲。在进入与听众互动环节时有的听众提问：

《尚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什么重要影响？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作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在这里只能以具体事例来简要地回答。譬如《尚书》中的《周书》里有八篇诰文，后人称之为“周初八诰”。这八篇诰文都与周初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有密切关系。他总结了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说殷商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邦”，有将近六百年的统治经验，结果在一个早上就被武王率领的盟国军队给推翻了，最后纣王自杀身亡。这个惨痛教训说明了什么问题？周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否长久，主要的不在于统治者手中有多少军队，有多么坚固的城池和多么严酷的刑罚，而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他说殷纣王自以为“有命在天”，只知道肆意挥霍，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又不听群臣劝谏，一意孤行，结果丧尽了民心，最后众叛亲离。归根结底就在于殷纣王无德，或曰缺德。所以周公在《尚书》八诰中殷殷告诫周人要牢记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提出要“明德慎罚”“克慎明德”“黍稷非馨，明德唯馨”。他谆谆教诲每一位王公大臣都要“勤用明德”，这样才能使得来之不易的政权长久稳固，才能够避免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周公在《尚书》八诰中反复强调以德治国这一思想，这对后世的历代统治者有极

为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对治国理政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我的这一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我列举的这些史实充分证明了德观念在殷末周初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德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时代，这在“五经”和诸子百家之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和非常生动的体现，德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详细的论证，我是完全赞同的。

现在，德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公开出版，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将面临广大读者的检验。我满怀欣喜地为之撰《序》，并借此向德龙表示衷心的祝贺。

2016年8月15日

前 言

本文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为研究对象，从探讨“德”观念的起源及“德”的本义入手，通过系统地考察“德”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涵，以期厘清先秦时期“德”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对“德”观念起源问题的探讨。本部分笔者对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家观点进行了回顾与述评，认为“德”观念的形成当介于“德”的现象与“德”字出现之间，它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和传统。并把早期之“德”界定为政治概念，以之为前提，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中对传说时代的追记，将“德”观念的形成同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进行了综合考察，把“德”观念起源的具体历史阶段锁定在尧舜禹时代。

第二章是对“德”之本义的探寻。本部分笔者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总结的同时，分别做了相应的检讨，赞同“德”之本义“行为说”的观点。通过挖掘传世文献中关于原初之“德”的思想遗存，结合尧舜禹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特点，对这一观点做了尝试性的补充，认为“德”的本义可以用“行为”来概括，但最主要的当指为政者旨在惠民利民的一套政治行为。

第三章考察的是殷商时期的“德”观念。有不少学者认为殷商时期不存在着“德”的观念，笔者通过借鉴吸收前人关于甲骨卜辞的研究成果，参照《尚书》中可靠的文献记载，对这一观点做了批驳。而后，以殷商时期的宗教观及其在此观念支配下的商人政治思维模式为历史背景，对《盘庚》篇中的十个“德”字的内涵做了分类解读，认为商代之“德”指的是殷王及其臣下的政治行为，它有着较为具体的实指内容。殷商时期的“德”观念沾染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并无伦理道德的意蕴，尚未达到对人内在品格要求的深层次维度。

第四章考察的是西周时期的“德”观念。西周时期的“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笔者首先将今文《周书》中相关篇章所体现的“德”的思想，分成四个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析，认为周初之“德”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其原始义“行为”的用法，“德”虽然具有了道德的意义，但还只是处于起步和萌芽状态，这与后世的个体心性道德尚有差距，周初统治者反复强调的“德”

多指好的有具体内容的政治行为，而非空泛的道德之论。其次，笔者对“德”与周代的宗法制、分封制及礼制之间的关系分别做了阐述，旨在说明周初各项政治制度的创设计图是为了体现并贯彻“德”的理念，周人所理解的“德”乃是出自于制度的外在约束，并非源于个体的内在心性，“德”在当时还不是“道德”的同义语。最后，笔者对西周中后期的“德”观念做了初步的归纳总结，认为西周中晚期的“德”与周初相比，所面向的对象范围和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初步地具有了哲学的内涵，并开始呈现出内面化、抽象化的发展趋势。

第五章考察的是春秋时期的“德”观念。笔者主要参照《左传》《国语》两部典籍中关于“德”的记载，对“德”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春秋时期的各种德行条目做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旨在论证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它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申说的，具有较强的政治功利性。与此同时，春秋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德行条目，表明人们对“德”的体认，逐渐从“善政懿行”的客观描述向“德”的抽象提炼发展。而后，笔者就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对“德”观念的影响展开论述，认为“礼”的新观念的确立及由此而引发的礼治思潮，使“礼”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形中削弱了“德”的政治功能，“德”逐渐地超越特定的政治层面，沿着精神层面而内向发展，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因素。孔子顺应了“德”的内面化、抽象化的发展趋势，站在“一般人”的立场上，通过对“仁”的发现与抽象，完成了对传统“德”观念的超越，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概念。

第六章主要考察的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德”观念。孟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将“德”完全植入人心，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自律，在政治上倡导仁政；荀子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提出性恶论，用“礼”来统摄诸德，重视礼义道德规范的外在他律，在政治上主张礼治。尽管孟荀二者的“德”观念因人性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们所言之“德”多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道德，他们的仁政与礼治均未脱离孔子所提倡的正己修身之道德本位的立场。

本书系北华大学学术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价值及意义	1
二、研究状况及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3
(一) 对“德”观念演变的动态过程做宏观考察的研究成果	3
(二) 关于某段历史时期“德”观念的研究成果	6
(三) 关于先秦典籍中“德”之内涵的研究成果	9
(四) 关于历史人物的“德”观念研究成果	11
(五) 对先秦之“德”有所关注的学术著作	13
三、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 “德”观念的起源	18
一、学界关于“德”观念起源问题的各种说法	18
(一) 原始社会说	19
(二) 殷商时期说	19
(三) 西周首创说	20
二、早期之“德”的概念属性	23
(一) 早期之“德”属于政治概念	23
(二) 原始道德的形成要早于“德”的出现	26
三、“德”观念起源于尧舜禹时代说	28
(一) 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29
(二) 早期国家的出现为“德”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35
第二章 “德”的本义之探寻	39
一、学界对“德”之本义的相关探讨	39
(一) 德得相通说	40
(二) 图腾生性说(属性说)	41

(三) 行为说	43
(四) 通过解析“德”字字形而得出的诸种说法	45
(五) 某些外国学者的相关观点	47
二、“德”之本义的再探讨	49
第三章 殷商时期的“德”观念	57
一、甲骨文中的“𠩺”字	57
(一) 关于甲骨文中“𠩺”字的训释	57
(二) “𠩺”与“德”的内在联系	59
二、从《尚书·盘庚》看殷商时代的“德”观念	62
(一) 《盘庚》中的“德”及相关解读	62
(二) 《盘庚》中的十“德”解	66
(三) 殷商时期的“德”观念概说	70
第四章 西周时期的“德”观念	73
一、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继承与改造	73
(一) 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继承	74
(二) 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	76
二、西周初期“德”观念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80
(一) “德”与“天”——以德配天	80
(二) “德”与“民”——敬德保民	83
(三) “德”与“刑”——明德慎罚	86
(四) “德”与“位”——任德尚贤	89
(五) 周初“德”观念概说	92
三、《诗经》中的“德音”考论	96
四、“德”与西周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105
(一) “德”与宗法制	106
(二) “德”与分封制	110
(三) “德”与礼制	113

五、西周中后期的“德”观念	117
(一) 祭公谋父对周初“德”观的继承与发展	118
(二) “天德”概念的出现	121
(三) 西周中后期铜器铭文中的“德”观念	124
第五章 春秋时期的“德”观念	128
一、春秋时期传统天命观的动摇	129
(一) 春秋时期对传统天命观的继承	129
(二) 春秋时期传统天命观动摇的原因及表现	131
(三) 春秋时期传统天命观的动摇对“德”观念的影响	136
二、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功能	141
(一) “德”是君主守国的根本	141
(二) “德”是霸主主盟的关键	143
(三) “德”是臣子保位的必备	145
(四) “德”是战争获胜的利器	147
(五) “德”是与刑并用的手段	149
三、《左传》《国语》中的德目举要	152
(一) 有具体所指的德政之目	152
(二) 从政治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德目	153
(三) 与“德”紧密相关的德目	156
四、“礼崩乐坏”与“德”的日趋内面化	160
(一) 对“礼崩乐坏”的理解	161
(二) 礼治思潮的兴起及其“德”的政治功能的弱化	162
(三) “德”的日趋内面化	166
五、老子的“德”观念	169
(一) “德”与“道”的关系	170
(二) 人通过全“德”而回归于“道”	173
六、孔子对传统“德”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177

(一)《论语》中“德”的新面向	178
(二)孔子“仁”的学说是传统“德”观念的超越	184
第六章 战国时期思想界的“德”观念	190
——以儒家学派为主的考察	190
一、战国时期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190
二、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德”观念	194
(一)性善论的提出将“德”完全植入人心	195
(二)孟子的“四德”说及其道德修养论	199
(三)“德治”理念的孟子式表达——“仁政”	205
三、荀子“以礼统德”的“德”观念	209
(一)荀子的“以礼统德”	210
(二)性恶论及“化性起伪”的道德修养论	212
(三)“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	217
结 语	223
参 考 文 献	225
后 记	243

绪论

一、选题的价值及意义

“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先秦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几乎与整个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如影随形，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与历史沉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到了中国的政治、宗教、伦理、社会、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及领域。“德”在形塑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和精神气质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德感”的基因，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①“德”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华文明影响之至深至远不言而喻，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德”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恐怕都不为过，“德”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和回避的永恒话题。

“德”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之中就屡有显现，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早期典籍中，始终是出现频率较高的最核心概念之一，这足以说明“德”在前轴心时代（春秋晚期以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占有着支配性的地位，“德”的观念乃是前轴心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思想主题”之经纬。^②随着周初以来政治理性的不断成熟与人文思潮的日益兴起，“德”又成为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墨、道、法四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诸子的著作中我们仍可发现“德”的踪迹。尽管“德”字在诸子著作中的出现频率较之以前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德”不再是先秦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了，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创作正是从“德”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中脱颖而出的，只不过是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用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术语表达着与以往不同的“德”观念而已。因此，“德”是先秦时期上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尽管它也是一个较为复杂、令人费解的观念。

时至今日，大家最常见的思维定势就是用“道德”来比附、解释先秦典籍中

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页。

②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的“德”，虽然可以勉强说得通，但总是会给人以一种意犹未尽、似是而非的感觉。我们并不是否认“德”有着道德、品德的内涵，特别是在春秋晚期及其以后的传世文献中。大体说来，原初之“德”并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在轴心时代以前“德”基本上属于政治概念，其功能与价值多体现在政治领域，自西周初年“德”开始有了道德义，而后，随着“德”的日趋内面化、普世化，“德”逐渐从政治层面抽离出来，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因素，经由孔子的继承与改造，完成了“德”由政治概念向伦理概念的转化，伦理学范畴上的“德”才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同时，“德”在道家那里主要转化为哲学概念兼具伦理概念，“德”除有道德、品德的内涵之外，更多的则是指向天地万物的“本性”之哲学意蕴。所以，将先秦典籍尤其春秋晚期以前早期典籍中的“德”，径直地用“道德”来理解，是不大妥当的，甚至会产生圆凿方枘的偏差与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论者对先秦时期“德”之内涵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注意到“德”观念也和其思想文化观念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历史长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关于“德”的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它不是一个自足静止的思想体系。缺乏了对“德”观念动态演变的总体纵向考察，就不能对先秦时期各时段的“德”之内涵有准确的把握，单纯地用后世伦理范畴的“道德”来体会早期政治范畴的“德”，不仅会产生“逆溯的误差”，也在不经意间漠视了“德”是一个融政治、宗教、伦理等方面于一体的较为的宽泛的概念，“道德”并不能囊括“德”的全部，先秦时期的“德”有着比“道德”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此外，由于“德”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引申义不断丰富，且本义仍与诸义并行而不泯灭，从而使“德”字的义项异常繁杂无序，以致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常常会顾此失彼。更不用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典籍当中，即使在同一典籍之中，“德”字的具体内涵也难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来概括。这就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研究难度，限于笔者的学识及能力，拙文并不力求对出现于先秦典籍中的所有“德”字之内涵，都能做出细致精准的分析与解读，只是选择“德”观念演变的这一动态视角，尝试着结合文献中“德”字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去做一点极为初步的具体而微的考索与梳理工作，以期厘清先秦时期“德”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我

们认为,若能对先秦时期各历史时段“德”观念的内涵有宏观上的总体认识,对于揭示先秦之“德”的原始面貌,领会先秦典籍中“德”字的意蕴,深化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研究状况及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从目前学术界有关于“德”观念的研究成果来看,把“德”观念局限于伦理学的层面上进行相关探讨是较为常见的做法,即多是就“德”所具有的“道德”内涵进行论述,此类论文和著作不胜枚举。而对于“德”观念的历史沿革及由此蕴含的丰富内涵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却是一个相对较为薄弱的环节,对此问题较为关注的学者,或是在论著中偶有涉及,或是以论文的形式进行阐明,以本课题为中心的专著尚属罕见。也有一些学者曾对先秦时期某一阶段、某一典籍、某一学派或某一人物的“德”观念进行过专题性的梳理。他们的研究在为我们提供写作思路、方法及重要参考借鉴意义的同时,多多少少留下了语焉不详之憾。郑开先生曾就学界对“德”的研究状况表达过这样看法:“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德’的研究虽然不乏契机与动力,却遗憾地呈现出某种浅尝辄止、纷纭无端而且缺乏系统性阐述的缺点。”^①这说明,目前学界对“德”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需要。

我们要系统地梳理先秦时期“德”观念发生发展的演变路径,就要涉及到“德”观念的起源、“德”的本义、各个历史时期“德”观念的主要内涵等问题,关于学界对前两个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拟放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进行罗列和评析,在此暂不列举,下面笔者就搜集到的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及相关著作,分类做一简单回顾。

(一)对“德”观念演变的动态过程做宏观考察的研究成果

斯维至先生不赞同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将周代之“德”理解为道德之意,由此激发了他对先秦时期“德”的思想及其演变问题的研究兴趣,故撰写了

^①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说德》^①一文。他非常推崇李玄伯先生的“德为图腾的性质”之说，把“德”的本义理解为生（性），认为“德”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训诂的问题，而是与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密切相关的问题”，结合先秦典籍的相关记载，大致勾勒出了“德”观念从上古至战国时期的演变历程。即“德”由性的本义引申出习惯法的意义，至西周“德”由内性而倾向于人事的努力和行为表现，春秋时期随着阶级的分化及权力的集中，“德”开始从一姓一族的德渐渐转变为个人的道德品德（在孔子那里可以得到证明），战国时期由于思想家们热衷于讨论性命问题，使得“德”的生性本义再一次被发掘和发扬。

巴新生先生在《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②一文中，同样是借鉴了李玄伯先生“德为图腾性质”说，与斯氏不同的是，他将“德”的原始意义理解为“图腾”，并以此为研究起点，把“德”的内涵之变化与天命观、宗教观的演进进行了综合考察，大体上把“德”之内涵的演变概括为图腾崇拜（原始社会）—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殷商时期）—统治者的政行（西周时期）—道德观念（春秋时期）四个阶段。指出德观念演变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始终与政治密不可分，“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着不同的对象，其对象先后经历了“同一氏族的所有人—氏族部落首领—一人王—大众”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晁福林先生也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剖析了先秦时期“德”观念发生发展的历程，在其论文《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③中，以“德”观念“由天命神灵深化到个体内在心灵”的嬗变过程为主线，认为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天德、祖宗之德”“制度之德”和“精神品行之德”三个阶段。殷商时代的“德”观念处于天命神意观念的笼罩之下，“德”即是得到之“得”，能够得到天命和高祖的眷顾而有所得，就是“德”的内涵，与道德观念无涉。西周时代的“德”是指得于制度，意即由分封与宗法之规范而“得”，这种外在之“德”（得）尚未深入到人内在心灵的领域，故不完全是道德之“德”。春秋战国时期的“德”观念经由思想家们（主要指儒家）的改造，才将之深入到了人的心灵层面，即自得于

① 斯维至：《说德》，《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第74-83页。

② 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1-42页。该文出自于他的博士论文《西周伦理形态研究》中的第一章第二节。

③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92-204页。该文后被收录于晁先生的著作《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中的第二章。